

一个洋记者眼中的李鸿章

李鸿章传



◎[英]约翰·濮兰德 著
◎张启耀 译

风雨飘摇的清王朝，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造就了一个秉承儒家文化传统的文人，
一个深谙中国官场之道的封建官僚，
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东方俾斯麦」，
一个国人心中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李鸿章。

天津人民出版社

李鴻章傳

◎「英」約翰·濮兰德 著
◎张启耀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鸿章传 / (英) 濮兰德著; 张启耀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 - 7 - 201 - 05795 - 8

I. 李… II. ①濮…②张… III. 李鸿章 (1823 ~ 1901) - 传记 IV.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602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8.87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1 - 6,000

定 价: 28.00 元

出版说明

《李鸿章传》是英国人约翰·濮兰德写的向当时的西方人介绍李鸿章的著作,该书于1917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约翰·濮兰德曾经是《泰晤士报》的记者,并与李鸿章有过一定的交往。而我们推出《李鸿章传》的中译本,就是想将李鸿章还原到那个时代,向读者展现一个洋记者眼中的李鸿章,进而了解当时外国人是如何评价李鸿章的,如何看待中国的。我们不敢断言此书有着怎样的学术价值,但无疑,它是重要的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西方人对李鸿章的认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李鸿章,了解晚清的社会和政治。

此书中译本经过编辑与译者的反复修改,终于能够呈现给读者,其间虽然辛苦,但现在看来还是值得的。由于作者毕竟是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社会有一定的隔膜,而且不自觉地站到了西方殖民者的立场上,加之李鸿章又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所有这些都使得本书的某些观点和措辞有些偏颇甚至是错误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李鸿章的评价有失当之处,多有溢美之词。如赞扬李鸿章是最伟大的人,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人,甚至是超人,是最忠诚的爱国者等等。这种评价显然是不准

确的。李鸿章虽然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毕竟是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无论在领土主权还是经济命脉，乃至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让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我们评价李鸿章的历史地位时所不能不认真对待的。

第二，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持否定态度。如否定太平天国、捻军和义和团运动，称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抗争的人们是暴徒、是抢劫者等，这显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第三，站在西方殖民者的立场上称赞侵华的侵略军头目。如戈登本来是一位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作者却盛赞他是一位诚实的、有武士精神的人，竟然把一个两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人说成了英雄。

第四，粉饰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如说英、法、德、美等列强只是想和中国做生意，并无领土野心等等。

第五，片面评价清朝的主战派人士。如说张之洞、左宗棠、刘坤一等人无知、幻想，不能认识客观形势等等，实际上反映出作者对于当时中国一批立志图强的爱国人士充满敌意。

尽管我们对书中的行文作了某些必要的删改，但上述种种错误观点，仍无法悉数摒除，因而还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本书，看清楚作者的根本立场。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7月



译者序

本书作者约翰·濮兰德(1863—1945年)曾经在中国担任海关官员,是赫德的机要秘书,与李鸿章有过一定的交往,同时,他也曾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走访和游历中国,并就一些问题对李鸿章进行过采访。具备了这样的一些身份,濮兰德撰写《李鸿章传》一书就应该让人感到有较高的可信度。当前,李鸿章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颇多但同时又争议频生,有些重要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因此,出自李鸿章同时代的异国之人的资料当显珍贵,故而,当天津人民出版社把这本原著交由我翻译的时候,我便欣然领命,决心下工夫完成这个任务,以便使当今更多的普通读者和有关研究者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再次对李鸿章进行了解并作出自己的评判。

可以说,该书的最大特点是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对李鸿章予以介绍和评说,既能使读者全面地了解主人公的重要活动、习性、主要思想等,也能使读者感到作者在写作李鸿章时细微的手笔和深刻的见解,使栩栩如生的主人公形象跃然纸上。在写作顺序的安排上,虽然文章总体上运用了编年体形式,但在具体章节和内容安排上又不乏灵活性,有些章节可以说就是一篇专题,比如像第四章“外交官生涯:与法国和日本的关系”、第七章“国务家和政治家”、第八章“个人的思想倾向”等,方便了我们对于李鸿章的进一步研究。

就本书的学术意义来看,虽然我们不能奢谈它有多高的价值,但至少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性,因为作者对李

李鸿章

鸿章的把握和评价还是比较全面的。作者一方面对李鸿章思想中的很多见解大加赞赏，一方面又对其性格中自私自利、重于钱财的阴暗面极力鞭挞；一方面对处在芸芸众生里的李鸿章表达了“高处不胜寒”的悲凉之情，一方面又嘲讽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和百官群僚目光短浅和迂腐保守，因此，整体上比较公平、客观地描绘了李鸿章不同寻常的一生。

当然，从我们现代的角度来看，在某种程度上，该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作者本身是一位英国人，从大的方面来说，其世界观和人生观与我们的有很大差别，从小的方面来说，正是他的国家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其他侵略战争，因此主观上会对本国的一些侵略者叫好，如书中对戈登这样的英国军人赞赏有加，说什么他是诚实直率和具有武士精神的战士，他的优秀品格把李鸿章的思想引向欧洲文明的道德方面。此外，作者还把戈登这个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说成是渴望中国人从苦难的内战中早日解脱等等。书中对李鸿章的评价也有不当之处，主要表现在对李鸿章的过分赞誉，如论及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时，称他是19世纪的一位创造者；在谈到李的外交政策时，也不顾中国人民的感受，而是站在本国的立场上，把李鸿章软弱妥协的政策不分青红皂白地都称作高瞻远瞩、远见卓识。相反，作者在书中却引用李鸿章的话把张之洞、左宗棠等要求坚决抵抗外来侵略的清正廉洁人士称作“咆哮的狗”。实际上，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虽然还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其政策所导致的某些后果使他最终难逃其责，而且，由于李鸿章身份显赫，高居总理大臣之位，控制了直隶地区，专断外交事务时间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但其精明能干的政治才华

却用错了地方，在很多情况下，他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而是关心他自己的钱袋子，关心他自己的区域力量，只满足于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的变革，结果最终使中国失去了走向现代化的最好时机。

在翻译过程中，原著中有些不足之处不得不被适当处理，尤其是当涉及到中国主权、民族关系和民族感情的问题。比如说，作者在撰写过程中有时站在西方学者的立场上往往把满族人和汉族人称呼为满人和中国人；把中国的一些民族英雄如林泰曾、刘步蟾等因不满外国雇员飞扬跋扈的行为称为阴谋活动等。所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要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明辨是非。

该书原由尚福恩女士翻译，但由于时间和家务问题，她仅翻译了序言以及第一章和第二章，被迫中断，出版社交给我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我的恩师、亲朋好友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大力帮助。导师王先明在百忙之中亲自过问此事，督促晚学勤励进取，提高了翻译的质量，加快了翻译的进程；出版社抽调了几位精兵强将对译文进行了修改和编辑，其辛苦和劳累程度是可以想象到的。尤其要提到的是，出版社的张献忠主任、唐静编辑为此书的翻译忙于奔波，搜集资料，查找词义，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另外我的父母和爱人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使我能够安下心来进行此项工作，最终完成了这一任务。

当然，翻译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例如，著作中的有些原文是作者对李鸿章、左宗棠甚至其他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大臣的奏折所作的自我理解，其本身可能就有含义上的误解，如果我们再来拿这样的话语去翻译成中

李鸿章传

文,那往往会离题千里,其结果就可能造成对事实真相的湮没,也最终影响到整个翻译工作,因此,寻找最原始的资料——当时大臣们的奏折,就成了重要的任务,但是,有些奏折可能根本就没有流传下来,因而也就无处可寻,此不免为一大憾事矣!另外,原著引用了大量的法语、拉丁语、中古英语,有些词汇的含义尽管多方查询,但仍然不能尽得其意,也影响了翻译工作。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加之本人水平有限,故翻译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们在今后能给予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得到修订完善!

张启耀

2007年3月13日于南开大学



原版序

原版序

下议院大厅是举行各种精彩仪式的场所，斯皮克（Speaker）先生的列队仪式每天在这里进行，前面有手持权仗的卫士开道，左右有首相及国务大臣陪伴。布莱克·劳德（Black Rod）也会定期到下议院大厅来。每次他都会当着斯皮克先生的面郑重其事地把门用力关三次，然后才召集下院议员们到上议院集会。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二十年前一个夏季下午目睹的一幕：我走出议会大厅时，与李鸿章不期而遇。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身材奇高、容貌慈祥。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而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很难想象这一代或上一代人中有人能与李鸿章相媲美。这并非因为他的巨大成就或个人权力给人的深刻印象，而是因为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当我们还处于野蛮状态时，中国人已经拥有了悠久的文明，即使在今天，他们在某些方面仍然超过我们。随着政治的兴衰变迁，他们总是自诩有高等的文化，并对世界上其他民族拥有强烈的优越感，以及对本国及他国政事镇定自若的个人尊贵感。这些特征，毫无疑问主要缘于他们的闭关锁国和闭目塞听。约翰·贝尔^①先生曾于1715年随彼得大帝派遣的一

^① 约翰·贝尔（1691—1780年），或译作柏尔，苏格兰人，1714年入俄，因略懂医学，次年随俄国使团赴波斯。1719年7月14日从莫斯科出发，随伊斯曼罗夫（Leoss Ismailoff）使团来华，抵达北京后晋见康熙帝，留居四个月，并于1722年1月5日返抵莫斯科。——译者注

个使团到访中国,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中华帝国几乎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隔绝;它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舒适宜人的气候条件。它东、南两面临海,西边和北边是一系列巨峰荒山,还有著名的长城做防御。但在我看来,比上述更能抵御外国入侵的是向西绵延几百里的贫瘠的沙地。东部和南部海域实际上是开放的,中国可能会遭到来自海上的袭击;但我相信没有一个君王会认为打破这样一个强大民族的宁静是妥当的。这个民族乐于与其所有邻国和平相处,他们看上去也在自己的领土内自得其乐。

一百多年后,约翰·贝尔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中国在东南沿海地区遭到袭击。李鸿章在19世纪的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于他是第一位中国政治家,他无愧于这个称号,欣然领命,应对这个古老国家面临的新的危难。其出身、所受教育、性情再加上其民族传统等诸多因素,使他很自然地对外来者持一种轻蔑的态度。然而,他是第一位承认“外国鬼子”不能被忽视、第一位出访美国的中国人,也是外国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中国政坛上不可忽视的第一号人物,濮兰德先生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李鸿章有很多重大缺点,这对于对政治问题不是很感兴趣的民族来说是自然的事情。但是,没有人能比他更娴熟地引领中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尽管李鸿章有诸多缺点,但他为中国,也为他本人在世界上赢得了远远超过他们本身所固有的重要地位。总之,李鸿章为中国史无前例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这个对外政策迄今为止还没有在中国存在过。

巴兹尔·威廉斯

1917年3月

目 录

原版序	1
第一章 引子:	
李鸿章事业发轫前中国之形势	1
第二章 早年的生活和家庭	31
第三章 宦官生涯	65
第四章 外交官生涯:	
与法国和日本的关系	109
第五章 外交官生涯(续):	
与俄国的关系·国外巡游·1900	
年和谈	159
第六章 海陆军管理者	185
第七章 国务家和政治家	215
第八章 个人的思想倾向	237
大事年表	267

第一章

引子：李鸿章事业发轫前

中国之形势



鉴于李鸿章是1850年以来改变中国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的多项变革的直接实施者，毫无疑问可以将他看作19世纪的一位创造者。但是，正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其“伟人”理论史的评论分析文章中所述：“必须将伟人与其诞生的社会环境一同视为过往历史的产物。伟人是整个一代人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同时是多个时代各种力量聚合的产物。”

为了客观地理解近代中国这位异乎寻常的风云人物的功过，我们以此作为研究其事业的开端，同时认真考虑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什么是最具支配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在讲述李鸿章一生事业及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前，有必要总体回顾一下其官场生涯开始时中国之现状，尤其要考虑欧洲物质文明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在李鸿章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名声大噪，从而为其军事事业打下基础之时，西方的军队和商人经常入侵中国，打破了中国的孤立状态。很显然，这注定会大大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习惯。对于顽固地反抗任何变革的民族来说，这种改变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很困难，同时会给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带来很多危险。在其同时代人之中，几乎只有他自己马上意识到这些新势力之强，必须通过从根本上改变旧的教育和政府体制来应对（正如日本的成功做法那样）。目前，中国政府认同的治国规范和传统即那些在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下证实行之有效的、基于道德力量及一成不变的某种文明基础之

上,能够维护专制统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李鸿章的伟大之处及其在漫长的工作生涯中所从事的各种活动的主旨在于:他从一开始就看到西方的蒸汽机和军事科学会使中国旧有传统迅速变成无用的、陈腐的、被遗弃的废物,但他在引导国人认识到这一事实及减少环境急剧变化带来的危险方面作出的努力注定会失败,这不仅因为中国人本性上就不能迅速完成这种转变,而且因为李鸿章本人在某些重要方面仍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政府官员。不可否认,其个人野心和对金钱的迷恋使他的很多工作染上污点,失去效果,甚至其最有进步意义的抱负有时也因其儒学思想的褊狭而大打折扣。但不管怎么样,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李鸿章初涉政坛时的社会状况还是有必要的。1851年,太平天国的势力已咄咄逼人,也正是在镇压这次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首次得到慈禧太后的嘉许,并在同僚眼中占有显要位置。那时李



慈禧

鴻章28岁左右,刚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殿试,从而跻身于翰林院大学士的行列。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三年,波及九省。它是中国历史上所显示出的有规律的重复出现的巨震之一,是中国社会制度下的经济状况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正如笔者在另一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自唐朝末年以来的历史(或粗略地说是从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以来),就会发现暴动总是周而复始地发生:用大屠杀将那些“天命已尽”的王朝消灭掉,剧变期与休养期交替轮回,几乎总是规律性的。这一切都溯源于潜伏着消极对抗的社会体制以及传宗接代的宗教责任。经济压力时断时续的缓解是以广大地区人口大量减少的大动乱的发生为代价的,而这种经济压力比欧洲历史上所经历的任何一次都要严重。仍然健在的人们还记得,他们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经过一代人之后,因太平军和回民起义^①所造成的数省的荒芜由邻省剩余人口重新填充,但接着又再一次面临饥谨这个可怕的幽灵。^②

只要中国在地理上仍隔绝于世,在政治上仍实行自给自足的政策,那么这些规律性发生的战乱和流血,这个对不断繁衍的过剩人口进行大规模毁灭的灾难,就成为

① 这里所说的回民起义是指1862年至1873年陕西、甘肃回民联合当地各族掀起的反清起义。——译者注

② “Recent Events and Present Policies in China”(《中国最近的事件和现时的政策》)(Heinemann, 1912)。

人的必然命运而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接受。这个民族业已恢复的力量由于生存斗争的激烈性和国家机构坚固的凝聚力而更为强化，而且总会成功地从这些周期性的发作中脱身而出。尽管发生着这些灾难，但由于遵守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的基本信条，这个世界上最为古老和令人尊敬的文明建立起来。可是太平天国起义不同于以往的动荡，它被严禁延续自然的法道去推翻这个王朝，但这个王朝在前后三位皇帝统治下业已证明自身的腐化，不能利用道德的力量合理地统治国家。外国人使用军队进行干涉，支持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这个王朝算是暂时安稳了下来，但是它的权威地位受到了动摇，恢复的希望非常渺茫。对稍有远见的人来说，由于变化的危险日益迫近，未来的天空变得暗淡下来。作为曾国藩军队里的一名指挥官，李鸿章通过个人的战场经历和他与戈登、华尔、白齐文等外国人的关系，很快认识到，凭当时中国的军事和治国手段是难以抵抗西洋蛮夷所拥有的军队的。他预见到了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局面；他意识到，如果要坚守古代传统的一脉相承而再沿着老路走下去，中国的主权和独立甚至都难以维持。此后，他的一生都在努力使国人明白这一事实。在将这些努力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在对当时中国整整一代人予以近代化的思想和管理的影响中，李鸿章被认为是19世纪的一位佼佼者。本书的宗旨即在于表明这一影响是什么，这一影响又是如何获得的。

李鸿章认识到了西方冲击的至关重要性，认识到了重新组织中国的政府系统和国家防务以对抗它的必要性，这一点在他1867年给皇帝的奏折中有很好的体现。这个能够解说他后来外交官和行政官生涯的重要文件，在合适的时候会被加满附注的。只要提到下面这一点就足